

● 刘晓慧

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中的《救亡日报》

1937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于上海合作创办的《救亡日报》是中共首次在国统区获得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舆论喉舌。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救亡日报》屡次遭到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查禁,先后由上海辗转广州,之后又到了桂林。抗战时期的桂林是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当时的桂林文人荟萃,救亡文化活动蓬勃发展,造就了“文化城”的美誉,享誉中外。^①

作为桂林抗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美术运动在当时十分活跃,所谓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是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桂林的所有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活动,以及美术家个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平。它既是“五四”以来中国美术的延续与发展,又是中国抗战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②桂林版《救亡日报》对当时桂林美术界不遗余力地报道与宣传,在其整个抗战宣传中极具代表性,对推动桂林的美术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选取的研究范畴是: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到1941年3月1日,驻桂林的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奉蒋介石重庆当局的密令查封报社,这一历史时期《救亡日报》关于桂林美术运动的报道。

背景描述

抗战时期,桂林之所以一度成为西南一带的革命文化中心,有其深刻的历史及社会背景。抗战初期,北平、上海相继沦陷,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各类文化事业机构或撤往武汉,或南迁广州。1938年10月,由于日军的进攻,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当时在那里的文艺界人



士,除一部分去了重庆、香港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三分之一的人都内迁至桂林。

当时的桂林政治环境极为复杂:国民党桂系^③控制着总的局面,一方面,桂系当局同蒋介石之间合作与矛盾共存,使桂林处于桂系同国民党中央若即若离的错综复杂的状态,蒋介石的复兴社、陈立夫陈果夫兄弟“C.C.系”、孙科的“太子派”、宋美龄的“夫人科”……以及一些进步组织都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据点;另一方面,桂系当局对中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原则上表示接受。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的方针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在桂林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是中共在西南地区一个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

桂林在政治上的特殊背景,使许多文艺界人士以及各类文化事业机构宁愿来桂林发展而不愿去重庆,毕竟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政治、

文化上的控制比桂林严。^④美术界也不例外,著名版画家靳中铁曾这样评价抗战时期桂林的美术界:“当时的桂林,由于政局的演变,已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美术“力量比重庆强得多”。^⑤据杨益群教授统计,当年客桂较知名的画家达250多名,几乎集全国画坛高手于一地,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张大千、丰子恺、关山月、黄新波、廖冰兄等。美术团体、院校多达40多个,其中包括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国民军事委员会漫画宣传队等全国性美术组织,以及徐悲鸿、张安治等创建的广西省立艺术师资培训班等。^⑥美术出版物更是琳琅满目,专著、画册107种。已发现的美术刊物(包括报纸的美术副刊)达26种之多,其中有不少是颇具历史、学术价值,弥足珍贵的,如《抗敌画刊》、《时代艺术》、《漫画木刻月选》以及《救亡日报》。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后,紧接着2月21日就出版了美术副刊《救亡木刻》创刊号。该刊为旬刊,主要刊登反映抗战运动的木刻作品,图文并茂。之后,为扩大漫画与木刻运动的发展,从第九期(即1939年5月11日)起改名为《救亡漫木》。除了这个专门的副刊板块,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救亡日报》对桂林美术界各项运动的报道和宣传从来都是不惜版面的,尤其是在其几乎每天出版的副刊《文化岗位》上,关于抗战美术运动的文章更是比比皆是,足见当时桂林美术运动的繁荣与兴盛。

桂林美术运动中《救亡日报》的报道与宣传

笔者查阅了《救亡日报》从1939

年1月10日复刊到1941年3月1日停刊期间的报纸原件,发现《救亡日报》有关美术运动的消息、评论、通讯、诗歌、图片等作品主要刊登在第四版。第四版主要刊登副刊《文化岗位》,《文化岗位》是抗战时期极为著名的一个副刊,几乎每天出版。第四版若不出版《文化岗位》,就出版其他专题副刊,其中就包括出版画展专辑,以及旬刊《救亡木刻》(后改名为《救亡漫画》)。其他版面也间或有些相关的文章和图片,比较起来,在第三版上出现的几率则更高一些。通过分析这一时期桂林版《救亡日报》关于美术运动的报道,可将其宣传重点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 倡导精诚团结、求同存异,以巩固美术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

《救亡日报》对美术界的抗战活动总是予以充分的报道和大力的支持。当时的桂林画展比比皆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救亡日报》不仅有展必报,而且常常用整版的篇幅刊登,如《留桂画家抗战画展特辑》、《黄超桂南战地素描画展特辑》等。《救亡日报》日出四版,能以整版的篇幅刊登画展,足见该报对抗战美术运动的重视和支持。而且如有必要,《救亡日报》甚至不惜版面。

1940年10月31日,著名国画家关山月在桂举办“关山月画展”,“《救亡日报》”11月1日即推出《关山月画展特辑》,不仅刊发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题词:“以崭新之笔姿,写桂林之风景,堪为山水写生色。”还刊登了广西临时参议会会长李任仁的文章《略谈山月的作品》。此外,还刊登了由黄旭初、苏希洵、黄同仇、杨东莼、陈此生、夏衍等人联名撰写的《介绍关山月先生个人画展》,称关山月“为艺坛大师高剑父先生入室弟子,亦一前进之新中国画家,能将大时代题材表现于国画上之成功者”,“纯熟之技巧,崭新之笔致,不但为国花别开生面,且为江山增色不少”。11月2日又对此次画展追踪报道:“关山月画展”共展出参加过苏联中国艺展

的《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和在香港举行个人画展的《从城市撤退》、《游击队之家》,以及来桂后所画的桂林山水、人物画等一百多幅。其中有十多幅桂林山水画和侵略者末日的宣传画,“已为桂林爱好艺术者出巨资定购”。整个展出“内容卓越,取材新颖,为国画进步之表征”。

除了画展的宣传,《救亡日报》也注重抗战美术运动中典型人物的宣传,比如著名漫画家余所亚。通过文章《看余所亚的画》(李育中)告知人们余所亚如何以坚强毅力,克服下肢瘫痪所带来的种种不便,积极筹备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举办“夜萤画展”、“春潮美术画展”,以及街头漫画展登,还开办漫画训练班,以促进桂林漫画运动的广泛开展。^①

《救亡日报》在全面展示桂林美术运动的同时,着重宣传美术界的友好团结。1940年5月27日,《救亡日报》专门刊登了艺术师资培训班负责人张安治评价桂林全省“抗战画展”的文章《美术工作者团结的象征》,指出“美展是桂林美术工作者大团结的象征,以往数十年来,我国美术,充满门户之见,互相轻视,使整个美术运动不上轨道,不能在学术上树立坚固的基础,抗战以后能放弃成见,在一致的目标下互相切磋,共同努力者仍旧是很少。可是桂林的同志已彻底觉悟到这一种固执的错误,在几次联谊座谈之后,便增加了互相的了解,树立了共同的信仰,而准备更进一步的合作。这美展就是代表团结、合作,向同一目标迈进的第一声。”

对于不同艺术观点、流派、风格的探讨,《救亡日报》总是推波助澜,促进争论的深入,推动抗战美术运动。但若发现有打击、嘲讽进步因素或新生力量,抑或争论双方偏离大方向,出现人身攻击迹象时,则会态度鲜明地予以制止、疏导。关于宣传画之争,便是突出一例。这场争论是由《抗战时代》发刊词中有关“宣传画(漫画)”的提法而

引发的。在1939年6月12日《救亡日报》刊发的《〈抗战画展〉特辑》中,阳太阳、汪子美、特伟分别著文对上述提法表示异议,并牵涉到对“学院派”的评价。张安治即于6月15日在《救亡日报》上发表文章《画论商榷》,表示要同上述三位画家商榷,就所谓“学院派”和宣传画提出不同看法。这场争论不断升温,在《救亡日报》上持续了十多天。双方各执其是,始终无法统一观点,且已开始离题。为使争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救亡日报》于6月23日发表署名施谊的文章《画论辩旁白》,作者站在“一个观察者的地位”,认为争论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尽可不必作关于宣传画的领域之争”,“不免是重复了世界美术史、艺术批评上的‘永久价值’与‘时代价值’之争,同时也就把‘宣传的’和‘艺术的’,又重新拉成对垒的分立”,“这样‘划地之争’”,不大必要;积极的辩论,则是彼此超越“划地之争”,“展开一个从矛盾到统一的辩证的理论斗争。因而可以达成画家们,对于作画态度,创作意识之步调的齐一,画家抗战之战斗力的提高,以及团结的更进一步的扩大”!文章最后希望双方开一次“严肃的但是欢然的恳谈会。这不但对于自己是无限有益,而对于敌人也正是无比的打击啊”。不久,双方结束了论争,遵照上述建议相互妥协,求同存异,达到了新的团结。

《救亡日报》根据抗战的现实环境,对美术运动的报道着重宣传精诚团结,力求巩固美术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充分体现了该报的革命性;其次,桂林美术界人士来自五湖四海,团体众多,彼此的艺术风格、主张及政治见解各不相同,关于艺术的探讨与争论自然时有发生,对这些争论,《救亡日报》总是全面地予以报道,合理地予以疏导,充分体现其办报的现实性和科学性。

2. 加强美术界理论建设,全力推广美术的大众化运动

早在“左联”时期,中国文艺界

就曾对文艺大众化运动进行过探讨。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抗战爆发后，文艺工作者通过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深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紧迫性。于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又被提上日程。桂林美术界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相当激烈，而且十分广泛和具体。讨论的中心是“是否以及怎样利用旧形式”。对此，《救亡日报》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纯的“旧瓶装新酒”，批判把“大众化”的美术作品贬之为“低级”宣传品，不要“艺术性”的看法，并发表《大众化并不是取消艺术》一文指出：“对于旧形式——民间艺术，应该是有选择的有限度的‘利用’，而不是盲目的‘台下’的叫好，当然也不是全盘的‘采用’。”“我们不同意：以为中国已有民间艺术便反对创造新的艺术和接受世界艺术的传染，当然更反对只要民众看得懂，不必什么艺术的‘艺术取消论’。”认为抗战美术“不仅是在于一时的宣传，而是在这次的抗战中吸取了新的内容，和创造出适合新内容的新形式！所以，‘大众化’是艺术的一种手段，要感动大众还是需要真正的艺术的。”^⑧

同时，《救亡日报》还强调大众化不但要改革，更重要的还在于创新。通过《中国化谈屑》指出，“由于过去改良门神、年画等旧形式过分的保守，把‘新酒’装进‘旧瓶’里去，实在旧瓶还是旧瓶，人们便以为那些是唯一的中国化的产品了，其实不是的。简单的说一句，中国化不但要彻底改革，而且还有创造。”^⑨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实践抗战美术的大众化呢？《救亡日报》认为关键在于画家要到生活中去。《谈漫画大众化》指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一个漫画作家，绝不是冷眼旁观，站在斗争的圈子外边作记录，把个人看作特殊地位的存在，如果要想有真实健康的内容，一定要跟大众生活经验学习，彻底了解大众，作家能这样，才有活生生的新鲜健康的内容，丰富了新的艺术形

式。”因此，号召“漫画作家要彻底改变生活”，“到民间去，到战场去，到敌人后方去。”^⑩

《救亡日报》在对美术大众化运动进行激烈的理论探讨的同时，也对桂林美术界在实践上种种有益的尝试，予以及时地报道，如连环画的出现。1939年3月21日《救亡日报》刊登了黄茅的文章《巡回漫展在湘桂》^⑪，文中写道：连环画之中的佼佼之作要数廖冰兄画、陈仲纲刻的《抗战必胜》连环画。当这套连环画于1939年3月9日至11日由漫宣队首次带往湖南零陵展出时，便以通俗生动的特色成为“轰动全零陵的创举”，那些惊奇的“湖南佬看得点点下头，口水也留下来了”。不久《救亡日报》又发表文章《一个时代的艺术》，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提起的是《抗战必胜》连环图共90余幅，大胆地采取民间艺术（至少是受其影响）的形式，以及经过浙、皖、赣、湘、桂数省与百余次的展览，民众都如获异宝的感到兴趣，最重要的还是它能以极通俗的绘画手法描写难以描写的政治、经济、军事各种抽象的题材。”^⑫

可见，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美术大众化运动，《救亡日报》都是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广，不断将其推向新的阶段。这充分体现了《救亡日报》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和对大众化的追求。

结 语

《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先生曾结合桂林以及全国各地抗战美术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抗战美术给予高度评价：“抗战以来的绘画在跃进着。大之如壁绘的制作，小之如方寸的木刻，都透露着美术活动的真实精神——科学的、大众的、现实的、革命的。”^⑬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报纸，《救亡日报》根据抗战的现实环境，对美术运动的报道和宣传着重倡导精诚团结，力求巩固美术界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充分体现了该报抗战时期的革命性；其次，艺术领域从来

都是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关于艺术的探讨与争论时有发生，对这些争论，《救亡日报》总是全面地予以报道，合理地予以疏导，充分体现其办报的现实性和科学性；此外，呼吁艺术家们深入生活，全力支持美术的大众化运动，则充分证明了其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和对大众化的追求。

可以说，《救亡日报》对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的报道，充分地再现了这种“真实精神——科学的、大众的、现实的、革命的”。而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媒介而言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极大的价值。

注释：

① 商娜红：《研究桂林文化城的报刊与报人》[J]，《传媒观察》，2006年第2期

② 李普文：《桂林抗战美术研究：范围、意义、现状、途径与方法》[J]，《艺术探索》，2008年第4期

③ 桂系是国民党新军阀时期统治广西的军事政治集团，属广西地方实力派。桂系前期代表人物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简称“李、黄、白”。后来黄绍竑投靠蒋介石，代表人物变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简称“李、白、黄”。统治广西前后共25年（1925年7月至1949年12月），同时统治安徽12年（1937～1949）

④ 魏华龄等：《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C]，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⑤ 鄧中铁：《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J]，《美术研究》，1980年第4期

⑥ ⑦ 杨益群：《划时代的壮丽画卷——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初探》[C]，《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

⑧ 赖少其：《大众化并不是取消艺术》[N]，《救亡日报》，1939年3月11日

⑨ 黄茅：《中国化谈屑》[N]，《救亡日报》，1940年5月12日

⑩ 张仃：《谈漫画大众化》[N]，《救亡日报》，1939年9月18日

⑪ 黄茅：《巡回漫展在湘桂》[N]，《救亡日报》，1939年3月21日

⑫ 赖少其：《一个时代的艺术》[N]，《救亡日报》，1939年4月21日

⑬ 郭沫若：《中国美术的展望》[N]，《救亡日报》，1941年1月20日

（作者为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